

情况早已缓解；另一方面，按照赵蕤的话说，愿意留在郾都区成就一番教育事业的年轻人，还真不少。“趁着机会，在大城市的优质院校学到更多专业技能，开辟我们这里的事业，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赵蕤说，“比如我们这里，本来特殊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能够逐步做起来，其实也帮扶到了特殊家庭。”

记者了解到，国家通过种种努力，拓展乡村和中西部地区优质师资队伍。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希望小学校长李灵称：“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特岗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银龄讲学计划’等帮扶措施，为我国农村补充了大批优质教师，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教育因此受益巨大。”

“几年前我调研过一所学校，开座谈会时看到学校里大多是老教师，少数年轻的都是代课教师。今年再去调研时，教师大多是充满活力的青年人。”

这些年轻人对本地教育事业，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崇明区发改委原主任陆一曾是

一名教师。他告诉记者，自己有幸跟着于漪老师听了整整一年的课，一年下来，他叹服不已：“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进行准备。有的课文她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陆一还表示，自己跟于漪老师一年的拜师学习，不光学到了于漪老师语文教学、教育的点点滴滴，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于漪老师对党和国家教育事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不断探索的执着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一生！即使离开了教育岗位，于漪老师的精神也是我取得所有成绩的支撑！一年拜师，受益终生！”陆一感怀道。

由陆一所经历的往事可见，在教师岗位上，能够明确自身定位与目标，而不懈追求，特别是求教于身边同事、前辈者，无论未来是否从教，人生必能有所成就。

教学与科研的平衡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不断求

教于同仁、前辈，是一种主动追求。与此同时，不同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更规定了网络教学平台、业余进修课时等等。但目前来说，教师工作负担水平近年又有所加重，亦是一个足以引起重视的现象。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薛海平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诗雅最近发表于《中国教育学刊》的文章《“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研究》写道：“‘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问题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课题组基于2023年在全国11省12市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比较‘双减’前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突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13小时；参加了课后服务的教师、女教师、班主任教师、初中教师的工作负担更重。与‘双减’前相比，‘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和结构都有明显变化，教师教学性事务时间增加显著。”文章也提及，教师工作负担受到教师个体和学校两个层面多重因素的影响。记者调查发现，“双减”本意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可在一些学校，却反而将原本的放学时间统一为所谓的“课后服务”时间，并安排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老师进课堂，如此一来自然其实并没有起到“双减”实效，反而加重了教师工作负担。

如何合理分配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本位？薛海平教授认为，对义务教育

左图：汇师小学上世纪90年代的电化教学。

